

八路军中的印度大夫巴苏华

□ 张颖

他是抗日战争中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成员，是医疗队里在中国工作时间最长的医生，也是将针灸引入印度的第一人，这个人就是八路军中的印度大夫巴苏，中文名巴苏华。

到延安去

巴苏华1912年出生于印度。1938年，26岁的巴苏华报名加入了印度官方派遣支援中国的医疗队。彼时，他从医科大学毕业不久，结婚刚刚3年。明明知道面临着危险，年轻的巴苏华还是怀着满腔热忱，毅然踏上这段未知的旅程。在华期间，巴苏华用日记记录了这段令他终身难忘的经历。在他晚年时，这本日记在印度汇编出版，名为《延安的召唤》。这既是一份珍贵的史实资料，也是巴苏华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友谊的见证。

1938年，巴苏华刚到国统区时就接触了中国共产党人，并被他们的革命热情所感染，因此迫切地想要去延安。9月30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四川饭店设宴迎接了医疗队，巴苏华见到了叶剑英、董必武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们相谈甚欢、相见恨晚，对彼此、对革命都抱有极大的热情。不久以后，巴苏华又见到了周恩来，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位有才干的中国领导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周恩来听到他们想为八路军服务的愿望，非常高兴，明确表示八路军会给他们最热烈的欢迎。在等待的日子里，巴苏华进行了体能训练，练习爬山和徒步行军。在阅读了《西行漫记》等作品后，他更加坚定了去延安的决心。几经波折之后，1939年2月12日，巴苏华终于如愿以偿抵达延安。

在延安，巴苏华与八路军建立了患难与共的亲密关系，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3月15日，巴苏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也亲眼见证了这位领袖简单朴素的生活：“简易的三孔窑洞，糊着纸的门窗，用箱子做成的凳子……吃饭时，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枪，却满怀信心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



1978年，巴苏华（右二）带领学生在中国学习针灸治疗

装。”通过与毛泽东的亲切交谈，巴苏华由衷地赞叹道，“这是一位博古通今，坚定勇敢的革命领袖”。几天后，巴苏华便前往在延安城东的拐岭八路军医院工作，担任五官科医生。一年的时间里，巴苏华彻底融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家庭，不仅给战士和乡亲们看病，还和大家共同参加生产劳动。这一段经历令他十分难忘，他后来专门写了一篇回忆延安难忘生活的文章，并将其题目命名为《兄弟间的情谊》。

前线救援中加深的情谊

正当此时，白求恩医生牺牲的消息传来，白求恩精神更加激励了医疗人员的斗志。“按照白求恩大夫的教导，医生不能在医院坐等伤员上门。由于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伤员往往因为送晚了引起严重感染和失血，并导致死亡，所以应该到前线去抢救伤员。”巴苏华和柯棣华等人热切响应白求恩生前的号召，迫切希望到前线参与医疗救助。1939年11月，巴苏华被派往晋东南前线，并于12月到达了山西武乡县八路军总部，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的接见。总部政治教育处负责士兵的扫盲，其工作效果令巴苏华非常震惊。他描述道，无论是行军还是在战场上，士兵们总是带着书，一有机会就阅读学习，“正是这

种环境提高了战士们的政治觉悟”。他在与八路军129师771团共同战斗时，与战士们同吃同住，承担了繁重的战地救护工作。有很多次炮弹就落在救护所附近，即使生命受到威胁，巴苏华也没有动摇与战士们共患难、共进退的决心。在接触过程中，他也更加佩服八路军将士的革命斗志和艰苦奋斗精神。

在晋东南工作一段时间后，巴苏华又辗转来到了晋察冀边区。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巴苏华读着报纸上振奋人心的捷报，急切地想要到前线去参与战斗，抢救伤员。得到命令后，他立刻赶往乌龙沟村，设立火线医疗站，把急速行军的疲惫抛之脑后。医疗站迅速开展救治工作，在两天两夜的时间里，巴苏华及其医疗队为250名伤员做了急救手术。这场战斗中，八路军战士与群众之间的军民鱼水情令巴苏华感动不已，村民们虽然自顾不暇，但还是愿意将房子腾出来借给医疗队使用。革命烈火中淬炼出的情谊，使巴苏华成为了“八路军及其指挥下的游击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淅灵战役指挥官杨成武说，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他们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在与八路军朝夕相处中，时间过得飞快。印度医疗队的其他几位成员中，柯棣华不幸逝世，另外3位医生因病先后回国。原打算在中国只工作1年的巴

苏华，却一直坚持了下来。1940年10月，巴苏华从晋察冀边区启程返回延安。到延安后，他向毛泽东表示，愿意留下来同八路军一起继续战斗和工作。同年，巴苏华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1942年底，印度国内形势危急，朱德建议巴苏华尽快回国，并将中国抗日经验带回去。为此，巴苏华在延安中央党校进行了几个月的政治学习，毛泽东、叶剑英等都向他介绍了战斗经验。

为中印友谊奋斗终生

1943年5月，巴苏华动身返回印度。与许多到过延安的外国人一样，巴苏华回国后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故事的传播者、中印友谊的促进者。他成立了“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巩固了中印共同反法西斯斗争的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巴苏华到北京系统地学习了针灸医术，成为将针灸引入印度的第一人，为推动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1976年巴苏华带领代表团来华参加纪念活动，为表达对毛泽东的钦佩之情，他将一块刻有中印两国文字的印度云石带到了中国，希望能够把这块云石砌入即将建成的毛主席纪念馆。1978年，时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率领代表团访问印度时，巴苏华全程陪同。1982年，巴苏华再次来到中国。此后，或是故地重温，或是访问交流，巴苏华多次返华，已然将中国当作第二故乡。

1986年，巴苏华病逝，他的一半骨灰被送到了中国，安放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从风华正茂而立之年，巴苏华把青春和热血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与八路军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余生之年，巴苏华始终记挂着中国的革命战友，并把毕生心血献给了中印友谊事业。



结根于西海 擢繁于中华

——来自域外的奇花异木

□ 李青

丝绸之路的贯通和畅达促进了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各国直接或间接的交流，商旅通行、使节往来一并带来了域外的珍奇物产、鸟兽植物。域外植物的输入到了魏晋时期已有大量记载可循。来自异域的奇花异木有两种途径被引进中国，一部分由使节进贡带入宫廷，有的种子通过宫内园艺人的传播得以扎根于宫墙之外，文人士大夫们出于玩赏心态购入这些稀有品种植于自家庭院之中；此外，外邦人来华长期居住时，也带来家乡的花木，聊慰去国怀乡之情。

域外花树入眼目

域外植物的用途主要有观赏、食用、制成香料和医药等。在进入中国之初，大多被赋予了丰富的异国想象，伴随着中国与其他文明不断的互通往来、彼此交流，大量的域外植物扎根中华大地，这些来自异邦的奇花异木深入中国的宫廷与民间生活中，对于中国人的生活习俗、民间信仰和文学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汉代，苜蓿、葡萄和石榴自西域引入中国。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其实，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魏晋时期，欧亚外国人杂居于中国内地，《洛阳伽蓝记》中记载：“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慰之。房庑连亘，一千餘间。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阙阶砌。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

乃至大秦国。”到了唐代，南方地区已是“海花蛮草连冬有，行处无家不满园”。域外花木丰富了中国人对于外来事物的憧憬，延展了中国人对于域外的异国想象。

唐代张谓曾向皇帝呈《进娑罗树枝状》，称“拔汗那国（今吉尔吉斯斯坦地区）有娑罗树，时称奇绝。不比凡草，不栖恶禽……但以生非得地，誉终因人。荣枯在于异方，委叶不闻于中土。陛下高视三代，横制四夷。威信浹于君长，仁惠沾于草木……如得托根长乐，擢颖建章。布叶垂柯，邻月中之丹桂，连枝接影，对天上之白榆”。张谓呈状，意在进奉异域娑罗树，以仁义惠及草木之喻来彰显大唐君主威信广传。异域奇木被视为福泽祥瑞之景观引入中国，借以彰显天朝气象、帝国荣耀，这种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时至今日，北京的一些古老寺院中仍有娑罗树，如潭柘寺中的娑罗树，是公元566年移植到这里的，中间已经跨越千年历史。

异域花木入心灵

扎根中华的异域花木入诗入画，丰富了文学意象、艺术题材。“天马来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外来植物成为文人笔下情感寄托的物象，为诗人们的诗歌作品增添了新奇斑斓的色彩。域外花木被种植于庭院，欣赏之余也激发起诗人们的文兴。比如，曹丕、曹植、王粲、陈琳都写过同一种主题的赋，即对西域迷迭香的赞颂。咏物抒怀，诗以言志，这些曾生长在异邦的花草，由诗歌这个媒介，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异域花木同样丰富了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形成新的民风民俗。在西汉，西域来的石榴在引种之初首先在长安上

林苑种植，因得到汉武帝的喜爱，又被栽种于骊山温泉宫。（唐代李商隐用诗歌来想象历史，他描写汉武帝的园林时写道：“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魏晋时期，石榴已栽种于达官名士的庭院里，也开始出现在花果主题的诗作中。傅玄的《安石榴赋》中称赞：“其在晨也，灼若旭日栖扶桑；其在昏也，爽若烛龙吐潜光。”潘岳的《河阳庭前安石榴赋》描述石榴果“似琉璃之栖邓林，若珊瑚之映绿水”。南北朝时，石榴已成为服饰花纹。梁元帝《乌栖曲》载“交龙成锦斗凤纹，芙蓉为带石榴裙”。康熙年间成书的园艺学著作《花镜》中记录，如要“四时有不谢之花”，则正月需移植石榴，五月则有“榴火烘天”。石榴果多籽，象征着丰收和繁育，这在世界很多文化中都有所体现，石榴传入中国后，火红的花色和累累硕果的植物形态热烈喜庆，其自身所含的文化象征也契合了中国人多子多福的传统期盼，因而深受中国人的喜爱。在中国文化中，石榴又被赋予吉祥、和睦、团结、昌盛等文化象征意义，成为了意蕴丰富的文化符号，表达中国式的美好寓意。

奇花异木承载的文化记忆

同一种植物，在不同的文明地区有着不同的生长状态，凭借不同的文明中介得以传播。约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桃种经由中亚向西传到波斯，之后由波斯传到亚美尼亚，又传到希腊、罗马。7世纪时，撒马尔罕（即唐朝人所说的康国）曾两次向唐朝宫廷进献金桃，《唐会要》中记载“康国献黄桃，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金桃唤起人们对于桃子的美妙遐想，也激发了对于出产金桃的撒马尔罕的美好想象。《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其国“异方宝

货，多聚此国。土地沃壤，稼穡备植，林树蓊郁，花果滋茂，多出善马”，是物产丰富、肥饶美丽之地。长在中国的桃树被带到西方，桃子在罗马成为了婚礼的象征，而其在中国文化中长寿永生的含义则没有被吸收。撒马尔罕的金桃又进献给中国，由于与中国本土桃子形态不同而受到追捧，其品种在宫廷的御苑中得到精心培育。

16、17世纪时，欧洲人从美洲引入观赏花卉。这些花卉到了18世纪时已经在欧洲普遍种植，并经由欧洲人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明清时期，欧洲的使节、商人、传教士们带来欧洲本土的观赏花卉，也一并带来了欧洲人在美洲所发现的植物。在故宫院藏的蒋廷锡所绘《花卉虫草册》中，描绘了原产自墨西哥的孔雀草。在乾隆时期的绘画中，孔雀草多次出现。在清官绘画作品中，宫廷画师们将外来花木与本土的植物搭配在一起，形成一种中国式的祥瑞图景。

来自域外的花木中，有些只是一时一处短暂地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由于水土不服而销声匿迹；有些则得到良好的培育，扎根中华，长久地留存下来，成为我们如今司空见惯的植物，融入中华大地，生长出新的形态与文化意蕴。植物在自然界繁衍生息，同时，在人类社会层面，植物经由人类活动被传播、交换、栽培。在长久不断的交流、沟通过程中，不同文明对各种植物形成了审美和感知观念的互通，共同构建了与异域文化相关联的集体文化记忆。



10至13世纪中叶，中原与周边地区政权更迭，时局动荡，丝绸之路之上同样也是政权林立。河西走廊和西域各地由不同部族和不同政权割据掌控，使得五代十国、辽、宋、西夏、金政权并立交错这段时期内，民族关系纷繁复杂，统一王朝掌控下的丝路交通不复存在。

开辟通道

经过汉唐时期的发展，陆上丝绸之路的路网趋于完备，这一时期道路发生的最大变化是，西夏立国后，在积极利用前代遗留下来的丝绸之路的同时，开辟了包括西夏通过“直路”在内的横贯鄂尔多斯通道，开通了从兴庆府（今银川）西至凉州（今武威）、经河西走廊通西域的路线，还把东西向的河西路与居延路连接在一起。

西夏建都立国后，取道灵州与北宋进行朝贡贸易；西夏又向辽国称臣，由兴庆府开“直路”直达辽上京（今巴林左旗）。由兴庆府通往河西走廊这一段也是这一时期开辟的，经河西走廊到达西域诸国。西夏占领灵州和河西地区后，严密控制着境内的丝绸之路。宋朝与西域的陆路联系，不得不西出秦州（今天水），经过西夏控制区和吐蕃地区，逾越柴达木盆地和阿尔金山，才能到达于阗及其以西地区。此路作为丝绸之路的偏道，自然条件恶劣，行旅安全无法保障，因此北宋仍经兴庆府取道河西走廊。

甘州回鹘入贡于宋之后，一开始走灵州道或草原道，后来则经青海道入宋。西州回鹘经青海道、河西走廊入贡于宋，但到北宋末年，回鹘贡使都经由西夏与北宋往来。

辽国与西域的交往，必须南下居延海，经过甘州、肃州、瓜州、沙州等西夏境内之地，然后西至大食（阿拉伯地区）等国，回鹘商人与辽进行交易，往来必经西夏地界。西夏对于辽与西域的政治往来和经济交流，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宋、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均受制于西夏，再加上宋朝与外域的经济文化交流逐渐转移到海上，陆上经济文化交流日渐沉寂。

贸易往来

这一时期，统一王朝掌控下的丝路交通不复存在，但丝绸之路之间接的经济文化交流仍在持续发展。陆上丝路诸政权成为中转经济文化交流的中介，宋朝、辽国与西域的商贸往来主要以控制丝路交通的归义军、甘州回鹘、吐蕃、西夏为中介。

沙州归义军政权（唐宣宗时期至宋仁宗时期的沙州地方政权）不仅与河西走廊的甘州回鹘进行贸易，而且归义军政权也与中原王朝的后晋、后汉、后周、北宋进行贸易。归义军政权于于阗（今塔里木盆地地区）进行玉石和丝绸贸易。于阗玉石通过沙州被大量地运往敦煌并入贡中原，同时也输送到甘州回鹘、西州回鹘等其他丝路王国，成为这些丝路王国或地方政权向东方贸易的“特产”之一。后周时，官禁放开，民间贸易随之兴起。宋朝和于阗之间玉石官私贸易兴盛。于阗经回鹘向北宋进贡珠玉、珊瑚、象牙、乳香、琥珀、龙盐、水银和战马等中原稀缺之物。

五代至宋，甘州回鹘与中原各王朝关系密切，经常派遣使者朝贡，并接受中原王朝的回赐，同时也通过朝贡的名义和方式，在丝绸之路沿线进行贸易活动。甘州回鹘商人把中原地区的物品，如丝绸、银器、黄金器、美酒、小儿药等运往河西走廊，再辗转运往中亚、波斯、阿拉伯、印度乃至欧洲，同时把河西、中亚、波斯等地的物品运往内地，甘州回鹘以波斯锦、回鹘战马向中原贸易。由于甘州回鹘的维护，使丝绸之路在西夏的威胁下没有完全中断，有时还得畅通无阻。

西夏控制丝绸之路要道河西走廊以后，大做转手贸易，成为丝绸之路之上最大的贸易中转站。西夏通过“岁赐”，从宋朝取得银、绢、茶叶，还通过“贡使”，

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 王旺祥 张连银



从宋朝取得数额惊人的物品和金钱。在西夏与宋朝的榷场贸易中，西夏除了本土的土产，还用西域特产与北宋交易。西夏贡使还在路途私自与宋朝百姓交易。西夏每年通过岁赐、回赐、贸易等途径从北宋获得大量丝绸、茶叶；通过“贡使”贸易、走私贸易、民间贸易获得辽国的特产。西夏通过与宋、辽贸易获得的商品由招徕的西州回鹘、大食商人再向西贩运。

西夏以地主的身分从宋、辽与西域的经济交往中抽税。许多产品并非西夏所产，西夏从过境的西域商人，主要是在回鹘商人中以关税的形式抽取。西夏还通过官方和民间贸易，积极投身到国际市场中去。经西夏中转后，或东进辽、宋、金，或西入西域、中亚。西夏商人从西域购买、转手卖给东方的产品种类繁多，包括安息香、檀香、玉石、玛瑙、琉璃等。西夏输往西域的商品，除从宋朝获得的丝绸、茶叶外，其土产则为大黄，西域商人在西夏境内购求优质大黄。哈密州、沙州大黄也向西输出。西夏商人东进辽、宋，西出西域，贩卖土产，转运丝绸和珍宝，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西夏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使转手贸易成为其对外贸易的主要特征，而西夏客观上在内地与西域及欧亚经济间起到桥梁作用。

辽宋夏金时期，物种也经陆路丝绸之路在东西方传播。如10世纪早期，叶用甜菜和根用甜菜由波斯传入中原，西瓜由摩尼教传教士从中亚直接传入辽，再传入中原。

文化交流

辽宋夏金时期，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也持续不断。在文化交流中，西夏依然起到重要作用，它不仅是丝绸之路之上最大的贸易中转站，也是丝绸之路之上重要的文化中转站。大批精通汉、藏、西夏语，并具有较高佛学修养的回鹘僧人深入西夏，在引入大乘佛教的同时，又把汉、藏文佛经译成西夏文。西夏境内的丝绸之路也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重要路径。在世俗文化方面，回鹘的服饰与装束也传到了西夏。

总之，辽宋夏金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受当时西北民族政权分立大环境的制约，经济文化交流只有在各民族政权之间辗转进行才能实现。西北各民族政权对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继续畅通都作出了贡献，各民族通过丝绸之路的交往、经济文化交流，深化了民族交融。